

上篇：历史眼光

——族群地理与生态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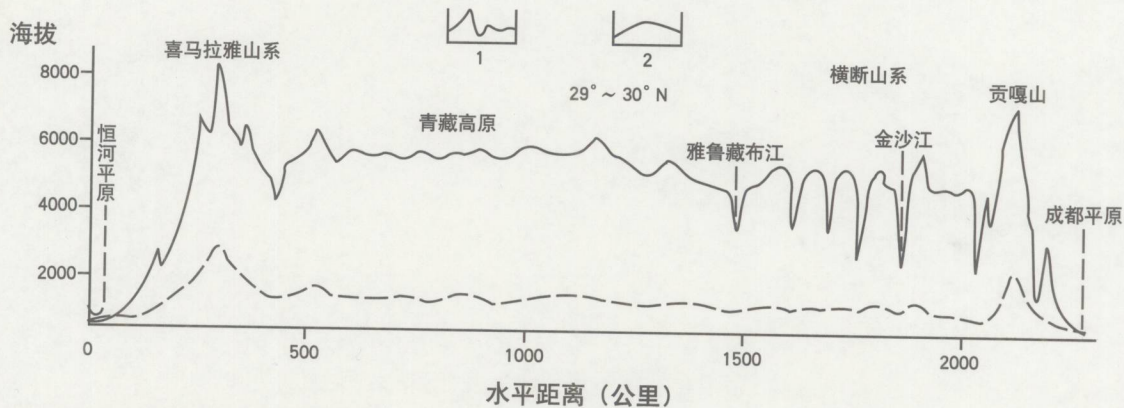
“横断走廊”的由来和意义

大约 340 万年前，一次大范围的地质变化引发了第四纪东亚大陆断陷盆地的发育和青藏高原的整体隆起。根据今日的研究分析，地质学家称此次变化为“横断事件”，原因是其基本证据均来自横断山区。

这次变化意义重大，不仅标志着亚洲大陆地壳“新构造运动”的开始，而且奠定了其影响所及地区地势高低的基本分布

及东西部不同的山河格局：在东中部平原，河流由西至东，四方大致平整；而在西部山地，山谷陡峭切割，几乎所有河流都在东经 95° 至 102° 之间从由西向东流急转为由北向南流……

横断山地区的范围，根据地质构造和地貌状况，地理学家提出了多种界定。其中的“七脉说”包括了很大一片地区，即自东而西为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即贡嘎山（雅砻江）、云岭—沙鲁里山（金沙江）、宁静山即芒康山（澜沧江）、他念他翁山（怒江）、伯舒拉岭—高黎贡山。而与之相应的行政区划，则不仅跨越了我国西南的众多省区、县市和村寨，^①甚至延伸至与之毗邻的东南亚地区。



▲ 青藏高原及横断山区地势剖面示意图

说明：1. 现今之地形；2. “横断事件”（距今约 340 万年前）时的地形。^②

^① 马丽华：《藏东红山脉》，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年版。

^② 陈富斌：《横断事件——亚洲东部晚新生代的一次重大构造事件》，载《山地学报》1992 年第 5 期，第 195 ~ 202 页。



↑ “横断走廊”位置影像图

横断山地区的特点，总起来说，可谓生态多样、民族众多、山谷深切、纵横交错。从深陷的河谷到高耸的雪峰，不到几十公里的距离内上下高差可达数千米。照地理学家的说法，东西方面，若以澜（沧江）怒（江）的分水岭——怒山、碧罗雪山为界，该地区可大致分为西部具有印缅风貌的湿热多雨之“热带亚热带风光”和东部体现滇藏风貌的“干燥寒冷之高原景色”。而从“走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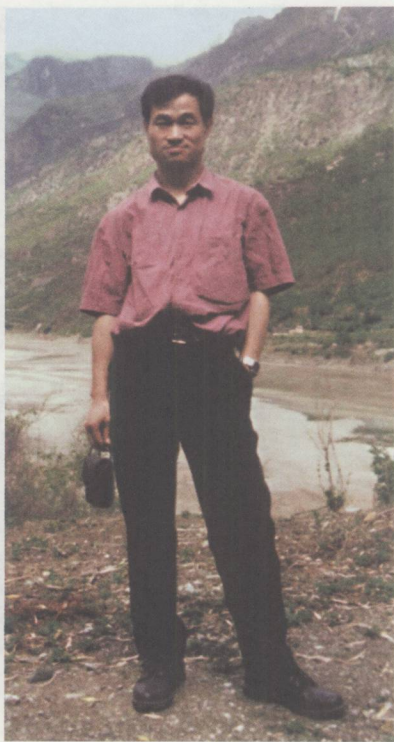
貌的纵向分布看，值得注意的是自北而南，其中气候景色的递变主要表现为：高寒草原—干旱谷地—水稻田带三个地段。^①其中贯穿南北的山川河流，一方面限制了东西向的广泛连接，使这里形成不了大范围的政治单位；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版图内的整个西部提供了天然的南北通道，于是孕育出与中原地区及东部沿海迥然不同的文化风貌。

① 严德一：《横断山脉中之气候蠡测》，载《边疆地理调查实录》，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族群地理与生态史观

有关西南地区“民族走廊”的论说，自人类学家费孝通在1980年率先提出，^①到21世纪初历史学家引入高校讲义并在网上传播，^②再到后来被自然科学家运用于对远古人类迁徙往来的解释，20多年来，已成了学界普遍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议题。如今又有学者呼吁重举前辈旗帜，在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意义上将“藏彝走廊”从“西南民族地区”的旧框架中“剥离出来”，并使之与过去的“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等提法相区别，用以统一称谓西藏东部和

↓ 岷江之源：横断走廊的生态构成之一。



➔ 1993年笔者考察虎跳峡时的留影。这里的深谷、急湾举世闻名。

川滇西部这个特定的“历史—民族区域”，从而在整体视野上把对中国的民族研究引向深入。^③

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此议题仍有继续展开的必要。在本书中，笔者采用“横断走廊”这一称谓，一是为了避免在族群称谓上的年代局限，二是力图使之与相应的自然生态结合，从而能在民族文化和族群地理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① 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 李孝聪：《区域历史地理教学参考大纲》，2003年版。

③ 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对“行省史观”的兼容和突破

以 1980 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环境来看，费孝通当年提出“藏彝走廊”的突出意义，就在于对“行省史观”的突破，亦即对“仅从传统的行政区划看待中国社会历史”这种单一史观的突破。

费孝通先生指出，以中国的民族研究为例，过去很难把问题了解清楚，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习惯于“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看不见“全国一盘棋”，从而也看不见整体棋局上的族群关系。^①针对这样的局限，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从宏观上至少可以分作包括“藏彝走廊”在内的十个部分。笔者将其总括为“六区三廊诸岛”^②：

1. 中原地区
2. 北部草原地区



↑ 桑科草原

①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 3 期。

②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1 页。

3. 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地区
4. 西南角的青藏高原地区
5. 云贵高原地区
6. 沿海地区
7. 西北走廊
8. 岭南走廊
9. 藏彝走廊
10. 沿海诸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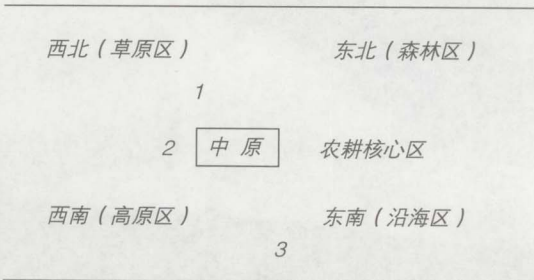
而这个整体棋局的“棋盘”，就是费孝通先生后来在倡导“多元一体说”时所总结的“中国框架”：“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一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广大地区，也就是如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范围。^①

这里，所谓“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广大地区，既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领土，又是漫长岁月里族群交往与王朝更替的历史范围。其中对大陆内的“六区三廊”划分和命名，虽同时兼容了地貌、方位和行省、民族的范畴，但里面沿用的行省名称，如“云贵”、“青藏（高原）”等，都并非强调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单位”，而是已经包含了更多的“跨行省”意味。与现今通行的行省区划相比，“六区三廊”的图式简约了许多。其力求突出的

是中华各族人民生存空间里地貌与族群间的内在区分和历史联系。

不过从该地区的族群关系及纵向历程考虑的话，用现行的族群名称——无论藏或彝或羌——来命名这条走廊都不合适。因此参照另外两个相关区域“河西走廊”与“岭南走廊”，不妨以“横断走廊”来为之命名。“横断”指刚好与之在地理上重叠的自然区域，“走廊”则代表其中的民族文化构成。这样，既使三大走廊在类型上对称，同时也避免了用“藏彝”命名对从党项到羌族等族群的古今遮蔽。

顺着这样的思路再对上述“六区三廊”图式作进一步简约的划分，则可以划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五方图式，而三个“走廊”地带则穿插在其中：



↑说明：1. 河西走廊；2. 横断走廊；3. 岭南走廊。

三个“走廊”相比，横断走廊的地势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岷江河谷的村寨

与区位呈现出的不仅是自北向南的“纵向”特征，而且山谷并列、界限分明。

关于“横断”的名称，历来说法不一。晚清时期，邹代钧为京师大学堂编印《中国地理讲义》，认为昆仑山“其接南岭之西部而当西藏之处，则山脉分向南北，名曰横断山脉”。后来有人从族群分布的角度指出，此山脉盘结之高原，“西连西藏，东垣于岷江之西”，曰“西番界”。^①另有人解释说所谓“横断”之意，指的是“南北行列之高山

深谷阻碍人类东西交通之动向”。^②

其实，“横断”之名是一种外来的“他称”。与之类似的还有“纵贯山脉”、“纵贯山系”等。从华夷整体的地理格局来看，“横”和“断”的界定，主要出自中原人看和走四方的习惯。本来，在“坐北朝南”的传统视野里，东西为横、南北为纵^③；而一旦面向西部推进，视线方位便有所转移：不但纵、横改变，群山深谷也成了路途之“断”，进而成为与内地山脉走向相反的象征……

① 陈富斌：《“横断山脉”一词的由来》，载《山地研究》1984年第1期，第31~35页。

② 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中国边疆学会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34~136页。

③ 今天的地理学家也作过相关的讨论，并指出古语之“合纵连横”，其“横”亦作“南北”解；而此是否与后人为“横断山脉”取名相关，还不得而知。陈富斌：《“横断山脉”一词的由来》，载《山地研究》1984年第1期，第31~35页。

四川大学的艾南山教授也对“横断山”的命名发表过专文，认为单方面渲染其对东西向的“阻碍”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样就抹杀了其南北向的贯通。^①我和艾教授有过多次讨论。我说这多半与中原式的“天下观”相关。他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这还值得从不同学科深入研究。可见，仅从“他称”的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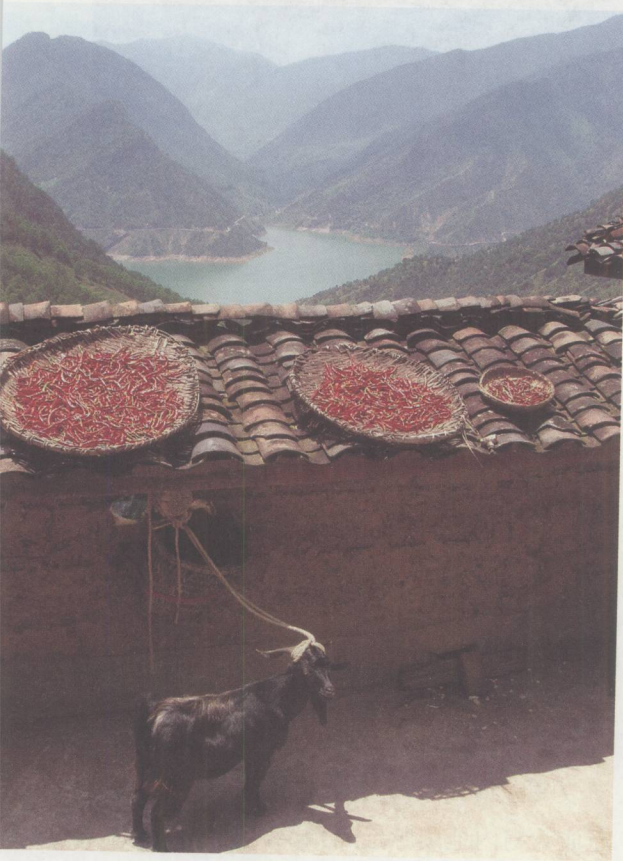
度而言，“横断”只表达了该事象的一面，而至少再加上“纵贯”一名，才可谓接近其本原。

当然，这些都是后人的引申和推论。若想全面理解横断山系的真实意义，除了追溯其被命名的外来原因及局限外，看来还得回到该地区本土人群的自我认知里，去关注其中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山河之名，比如：贡嘎山（雅砻江）、云岭—沙鲁里山（金沙江）、宁静山即芒康山（澜沧江）、他念他翁山（怒江）、伯舒拉岭—高黎贡山……

正如后来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费孝通先生的图式里，“走廊”的意义，在于为以往研究中国历史时的单一“板块”划分格局，增添了具有连接与动态含义的“通道”类型，从而使认识中华各民族间的漫长关联有了空间上的交往框架和互动视野。

近代以来，在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著述里，也表现有对“行省史观”的超越，即在空间上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来认识中国。如人类学出身的施坚雅教授便从地方社会经济辐射与联系的角度把“农业中国”分为8区：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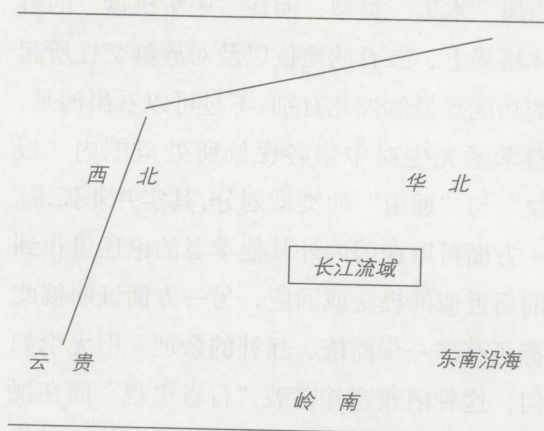
如果合并其中的长江流域的话，可以



▲ 雅砻江流域的水库和农舍

^① 艾南山：《横断山的地缘环境及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130～136页。

简约为如下图式：



↑ “农业中国”分区

在施坚雅的图式里，突出着若干个区域性的中心与边缘，但没有“横断走廊”这样的划分；同时，“北方草地”和“青藏高原”都不在其内。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施坚雅所分析的范围是“农业中国”及其区域体系中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对此，他强调了下面的这些特点：

1. 时至19世纪，“农业中国”可以划分为8个地方大区（如包括新增的东北在内而不包括内蒙

古等其他牧区的话，则成为9个）；其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农业区（或“农区中国”）。

2. 这些大区的形成与特定的区域地文界限相关，而所谓的地文界限往往就是历史上各政治分治力量之间的界限。

3. “农业中国”的这些地方大区，都有自我支持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心是起支配作用的核心城市。

4. 它们彼此相对独立并形成基本稳定的区域性空间结构。❶

不过虽然没有使用“云贵高原”与“横



↑ 草地民居：稀疏的邻里与空旷的大地。

❶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断走廊”式的划分，施坚雅却作了“外部边境”与“内部边境”这样的区别。前者包含着亚洲内地的地区边境，即“邻近亚洲内地疆域而不是农业中国其他地区的地区边境”，后者则突出着对“地文边境”与“省级边境”的分别。^①

对于为何要采用与费氏图式一致的“跨省”划分，施坚雅的解释是避免“省界”与“地文”相抵牾。他说，“即使是最接近一致的地方，——如四川同长江上游地区，两广同岭南地区——也明显地并不完全吻合”；而“有几个省就跨越好几个地区，最明显的例子是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贵州”。施坚雅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华帝国晚期的空间格局，仅就城市区域而言，并不表现为单独的一体化体系，而是“构成好几个地区体系”，并且“地区之间只有脆弱的联系”。因此只有分别地对这些地区加以分析、比较，才能够认识作为整体的国家（农区）。

值得提出的是，在施坚雅早于费孝通而提出的地区图式里，已经包含有“走廊”类型。比如他就把长江中游地区进一步分成了“走廊地区”和“支流盆地”，并以此分析武汉在“长江走廊”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作用。与主要处在横断山脉峡谷地

带的西南走廊不同，长江中游地区的“走廊”当属“水道”类型；而在“中华棋盘”的整体格局上，二者的地位以及对族群交往所起的功能等显然彼此有别。不过可以看出的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各民族所处范围内“板块”与“通道”的类型划分，其实并非孤说。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论述里找到前后近似的提法或回应，另一方面证明彼此都还有进一步商榷、互补的余地。但无论如何，这种因兼容并突破“行省史观”而在视野和方法上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所作的时代贡献，显然功不可没。

扩展来看，就像在研讨国际事务时大多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划分单位那样，审视国情而偏于仅以“行省”为基本对象，是现代国人普遍采用并习以为常的做法。这有利也有弊。什么是“省”呢？在中国的传统中，“省”实际是中央政权为了治国而人为设置的行政单位。比起相对恒稳的地文构成来说，这种工具式的人为单位具有更多的“变动无常”性。

对“省”的设置，金朝、元朝是转折点。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将蒙古初年沿用金后期的行省制度推行于全国，并在王朝演变的过程中根据统治需要而逐渐把“省”的地

^①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4～375页。

位和作用从原来的“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演变成为“常设的最高地方政府”。^①“行省”的全称是“行中书省”，最初就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比如四川省的全称就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辖地有成都、嘉定、广元、顺庆、永宁、重庆、夔路、叙州、马湖等地。到元英宗至治时，在全国五级制（省、路、府、州、县）的行政区划中，设有1个“中书省”（也称“都省”）总理全国政务，另设11个“行中书省”处理地方事务，长官称作“丞相”。《元史》载曰：

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

其中陕西和四川两省的设置沿革，就颇体现出因人为需要而不断更替的“工具”特征。《元史》记载说：“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在中统元年时，还“以商挺领秦蜀五路四川行省事”，至中统三年，却“改立陕西四川

行中书省”；而“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在元初时，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则“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到了二十三年，又“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

依照今日学者的看法，作为重要的国家政治手段，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原则主要有二，即“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前者尊重自然特征，后者突出统治需求。到元代时，统治者认为“为了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因而“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最重要的几条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②对此，清人储大文批评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③另有批评指出“事实上，元朝的行省制度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并认为“从此以后，州郡地方政府自汉唐以来的地位急速下降，因为中央政府常派大臣去镇压所在的地方政府。明、清两朝延续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中央政府权力直达地方政府的结果，对地方政事的推动，造成很大的阻碍，完全失去了由

① 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②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8～135页。

③ 同上，第128页。

中央和地方共同推行国家政治的意义。”^①

“州郡有时而更，山川千古不易。”照理说来“山川形便”的原则更符合治理农业大国的需要，但“犬牙相入”的区划格局却在实际上日趋主导。这说明了什么呢？地理学家周振鹤认为，其“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加强的事实。”^②

具体说来，明、清两朝对元代“行省制度”的沿用各有不同。明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司”，但流俗仍称省；十三年罢“中书省”。明朝鼎盛时期的行政格局为“两京十三司”，总称十五省。清朝的行省区划多“因明旧”，同时又将湖广、陕西等省一分为多，并在清的发祥地设“将军辖区”，在蒙古、青藏等地设“大臣辖区”，从而逐渐形成与明代不同的“内地十八省”与其他多处“辖区”并置分属的统治格局^③。

可见，从元朝时的11省到明代的15省，再到清代的18省，直到当今“海南建省”、“重庆直辖”之后的34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在中华各民族所处的文化空间里，“省”作为分析审视的单位是多么的变动不定。如今虽然行省作为国民生活的政

治基础稳固存在，但若仅以此为坐标和对象，而不加上时代说明并附以其他空间尺度，却来谈论诸如“四川文化”、“陕西经济”或“贵州民族”一类的议题，其局限和弊端是难以免除的。因此，提出“横断走廊”等类型划分的贡献，就在于对“行省史观”的兼容和突破。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从行省之外的别样角度看中国。

① 见 <http://www.contest.edu.tw/award/88/hist/a2872/www/yuan/201.htm>。

②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3页。

③ 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8页。

对“族群地理”的使用和阐发

在我看来，研讨中国历史文化时，能够从空间框架上突破“行省史观”的另一种视角是“族群地理”。其体现之一便是“民族走廊”这样的类型划分。

按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的解释，“民族走廊”是结合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含义后的命名；在中国历史文化中，能够被称为“民族走廊”的地方至少有两处，一处以“河西

走廊”为依托，一处位于横断山脉区域（或“六江流域”）^①；前者可以叫做“西北民族走廊”，后者则因特征是“其中所居藏语支诸民族为多”，故可称为“藏彝走廊”，^②也就是本书所称的“横断走廊”。

对于“横断走廊”的指涉范围，目前学界还有争论。但根据人们基本同意的看法，大致是一条“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和向南延伸的狭长地带，分属在陕、甘、青、川、藏、滇诸省区边境。对此，若只从行省区划的框架来认识的话，不仅难以准确把握，反易导致支离破碎感；而如果换用“族群地理”的格局来看待，则会有所助益。

需要指出的是，虽与政府设定的行省单位明显有别，但“民族走廊”的提法仍属人为



↑ 甘南藏地场景

① 李绍明：《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页。

② 李绍明：《再谈民族走廊》，见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区划之类型。正如费孝通先生当时所做的说明那样：为了帮助弄清楚该地区的民族演变过程，我们（需要并可以）“划出一条走廊”。^①

迄今为止，有关“横断走廊”的这种划分，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通道意义、地文表述和族群名称与族群关系几个方面。李绍明突出其作为“族群通道”的意义，试图对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迁徙路线”和“流动地带”加以分析；费孝通先生强调其“处在藏彝之间”，要探讨的是“民族演变过程”；石硕在认同此区域“线性通道”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地文方面的“自然屏障”特征，即因其地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而形成的东西屏障、南北通道之状况。也有其他学者对此“民族走廊”的“族属”发表了不同意见。而在任新建的论述里，则持“藏彝走廊”和“汉藏走廊”等皆可的态度。^②

这里重点说一下“族群关系”。首先应看到“走廊”的称谓采用的是比喻手法，突出其与别的“板块”区域比较时的“狭长地带”特征。可如若就此过分强调“走廊”内各族群的迁移与流动而忽略他们的世居传承，则有将此区域内长期以来众多族群的家园及生活“抽空”的危险。如今在岷江中上游大量

发现的石棺葬等遗址表明，千百年来，这里早已是若干族群生于斯、葬于斯的故乡。对此，有学者曾以“横断山文明”一类的判断加以过评述。因此，笔者认为若不加以限制，“通道”象征的滥用，无疑会导致在“族群地理”的划分中对“板块”类型的偏重和对“走廊”类型的看轻，以及对身处后者之中、堪称“弱势”的族群及其文化的忽略。

展开来看，华夷各族世代生存和交往的空间，在族群地理的意义上，经历了丰富多样的谱写和演变。在历朝历代的沿革过程中，交替上演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人间宏剧。在与“横断走廊”有关的区域里，自三国到南宋，先后出现过政权“鼎立”；时至晚清和民国，则形成从腹地到边疆的“族群共和”局面。^③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周边国界的划定以及国内民族自治区域的设置，中国的族群地理格局又有所变化。若以“板块”和“走廊”两种类型的对照、呼应来看，除了始终作为主干存在的“汉区”之外，在“横断走廊”周围呈现的便有藏区、回区、彝区和壮区等。它们被划定在省、市、县和乡等不同级别的各类行政区划之中。如今人们把处在横断山脉地带的“横断走廊”从行政区划中剥离出

① 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 任新建：《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见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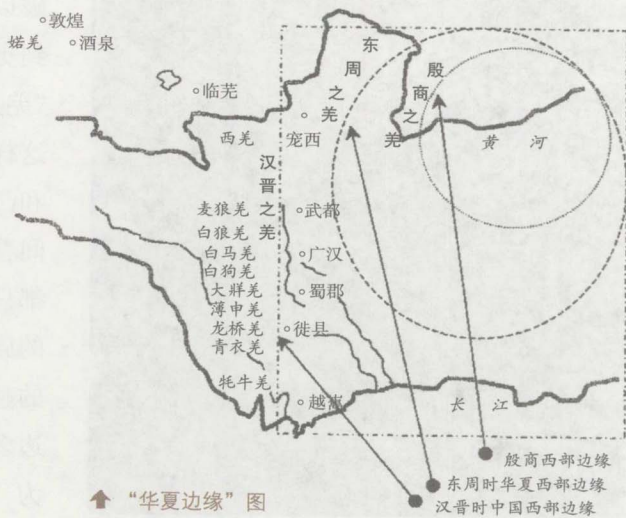
③ 胡兴宇等：《中国33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比较研究》，见陈国强等主编《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5～276页。

来,视为单独存在的一类区域,与其说整合了以往行省区划里的零散“部件”,不如说更凸显了整体中的族群关联。一些体质人类学家经过考察分析后提出,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分为三类,“藏彝走廊类型”便是其中一类,而“生活在藏彝走廊内的藏缅语族各族具有共同的体质特征,这指示他们具有共同的族源——古羌人。”^①

青藏高原东缘“民族走廊”因其间民族与文化的复杂,被认为是解答中国民族历史之谜的关键。本书以民族走廊上一关键民族——羌族,来说明汉、藏与西南氏羌系民族“边缘”的形成过程。

以上是引自王明珂先生新著《羌在汉藏之间》封底内容介绍的一段文字。该书讨论的内容即与“横断走廊”有关,而作者对此区域的界定是“在汉藏之间”,强调变动中的族群关系。王明珂把这一区域里的羌族作为变迁着的“地理人群”来分析,指出一种逐步形成于其他族群之间的“边缘”特征:即南有彝族,西有藏族,东有汉族。这样,对此区域内族群关系的审视和

书写,就同时成为“汉族西方族群边缘的历史”和“藏族的东方族群边缘史”以及“彝族或‘西南氏羌系民族’之北方族群边缘史”的交汇整合。^②在这里,王明珂其实是把西方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等的族群边界理论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有关事例结合,对变动中的“汉与非汉”(华夏与氏羌)关系作了可称为“族际过程”式的生动勾勒。在这样的勾勒中,人们看到的既非孤立自在的地文区域,亦不是分割肢解的行政单位,而是同时具有“族群中心”与“族群边缘”双重视点的族群联系。根据该著的图式,以自商至汉晋的“华夏视点”为例,这种依次移动的“族际过程”^③即表现为下面的“华



↑ “华夏边缘”图

①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

②③ 同上,第176页。

夏边缘”图。

值得引申讨论的是，针对王明珂勾勒的“汉”与“非汉”自西向东式的“族际过程”，李亦园先生作了重要补充，把所谓“汉藏之间”的区域特征进一步阐发为“族群缓冲地带”，认为生活在该地带像羌族这样的弱小族群，实际上担当着夹在汉族、藏族之间的缓冲作用。顺着此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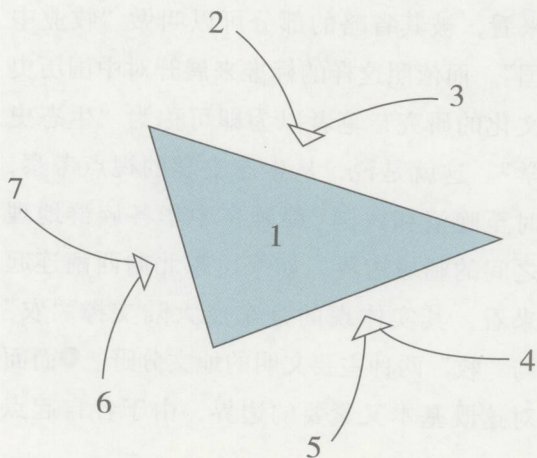
↑ 羌族民居：依稀可见的文化兼容。

李先生加以展开，把审视的空间移至岭南，然后设问道：为什么同样被认为是夏后氏或禹王之后的“越人”，会在历史中分散为许多群体的所谓“百越”？这是由于在南方没有一个较强大的藏族存在之故？^①显然，这样的思考、论述，又从族群地理的角度，把对华夷各族生存环境及互动关系的研究引向了更为深入的层面。

在笔者看来，与其早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②相比，王明珂新著《羌在汉藏之间》的最大改进，就是为观察“岷江中上游”地区的羌族地带增添了东部“藏区”和南部“彝区”，从而有助于突破以往单向的东面“汉地”视点限制，见到更为完整和立体的多重“边缘”；而所谓“羌人地带”式的强调，则使被“藏彝走廊”这样的简化命名遮蔽的弱小族群得到提示和凸显。不过从作为整体的华夷各族交往空间看，“羌人”地带也罢，“藏彝走廊”也罢，都只是局部。放大开来，还应审视宏观层面的族群关联。比如，对于“横断走廊”所处的整个“西南地区”，笔者曾作过使之与周边多方相连的探讨，并把它的位置特征描述为“多通道”和“大三角”，详如下图所示：

① 李亦园：《族群关系脉络的反思》，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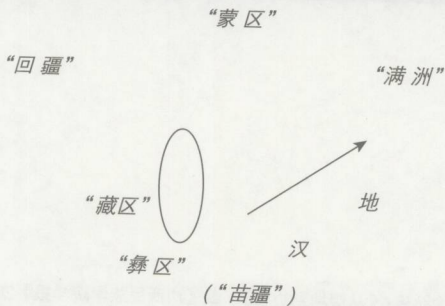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说明：1.西南三角地；2.黄河上游地区（西北）；3.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4.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文化带东部）；5.珠江流域（南方文化带中部）；6.东南亚半岛；7.印度次大陆。

图中“三角地”的上下横线代表“东西走向”的两江流域，西面斜线表示“南北走向”的六江地区或“横断山脉地带”。所谓“藏彝走廊”即处在后者范围。也就是说，除了与汉族、藏族、彝族等的交错外，这一地区的下角还受到东南亚半岛和印度次大陆的关联影响。

而如果再以晚清至民国时简化了的华夷图式来看，以所谓“五族共和”为其大势的族群地理亦告示着影响至今的疆域格局：



说明：图中的圆即表示今人所谓“横断走廊”的大致位置。

在当时的国势下，“五族共和”的提出实际是在族群地理意义上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旧式口号的扬弃，以及在新的国际背景里对华夷关联之“五大疆域”的再次整合。

概括来说，族群地理意义上的“横断走廊”，其所具有的区位特征和历史意义，远非简单的“通道”名称所能代表。就笔者个人的初步理解而言，其至少可以表述为如下方面：

1. 古“横断山文明”地区。
2. 氐羌族群的家园之一。
3. 华夏及其边缘族群的互动地带。
4. 藏语支诸民族的迁移通道。
5. 汉、藏诸民族的融合地带。
6. 现代“多元一体”之中国的“联结纽带”。

可见，该地带的族群地理内涵是多么的丰富多样，包括了从“氐羌故地”、“华夏边缘”、“藏彝通道”到“汉藏之间”和“联结纽带”等若干有待研讨的特征。至于最后的所谓“内部边疆”说，提出者是拉铁摩尔等西方人士。由此便引出了关于“生态史学”的议题。